

引子

## 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與列寧的過渡學說

看了大型理論電視系列片及其電視腳本《劉少奇與新中國——祇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掩卷長歎，浮想聯翩。新中國成立後，那一樁樁、一件件重大歷史事件，像過電影一樣讓你熱血上湧，怦然心動。

1968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如火如荼的瘋巔狀態，中國的歷史掀開了悲慘世界中的最不光彩的一頁。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在萬馬齊喑的文化沙漠之中，戕賊人性和破壞文化成為全民族的盛大節日。當時，我在內蒙插隊，劉源在山西插隊，在遠離政治漩渦的邊緣，卻湧動著知青文化的新思潮。

黃泥小屋，青燈一盞，天下第一快事，雪夜無人讀禁書，那時讀書的情景又一次次浮現在眼前。儘管那時書很少，人也很年輕幼稚，為了回答心中澎湃如潮的苦惱問題，一邊咀嚼文字，一邊品味人生，那才叫莫大的享受。而現在坐擁書城，大多數卻盡是油墨垃圾大爆炸，真是迥然不同。生產隊裡廣大貧下中農啼饑飢號寒，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他們對你說：「想『社會』，盼『社會』，『社會』來了硬受罪。」「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還穿破小襖，20多年過去了，叫人咋說共產好？」我們當時的生活極單調，每天都是「吃三睡五幹十四，剩下兩個小時抓大事。」而聽貧下中農憶苦思甜時，他們不經意地說出，「最苦苦不過六零年」。驚愕之後，催人猛醒，令人思考。

面對著慘淡的人生和為新中國奮鬥了一輩子的父母親友被關進牛棚迫害致死的現實，當我第一次讀了劉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

大會上的講話（包括毛澤東在劉講話時的不斷插話），眼前突然一亮，這確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親歷的實踐轉化為直覺，劉少奇對了。順著當時對劉少奇的批判「六二年的右傾和六四年的形左實右」，「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什麼「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對照《哥達綱領批判》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的提法，《列寧全集》25卷至33卷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說和新經濟政策學說，馬克思和列寧所堅持的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是「三階段論」而不是通常流行的由斯大林灌輸給我們的「兩階段論」。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的論述，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昇華同現。自由自在地讀書，東拉西扯地聊天，使我在1968年底寫出了《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社會主義體制問題的研究》。拙著迅速在全國知青中形成了手抄本，至今仍被幾十本研究當年思潮的著作反復研用。為了這篇著作，我曾嚐過「社會主義」的鐵窗滋味，但至今甘之如飴，毫不後悔。就對資本主義之批判這一點，我今天仍是一個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態度之堅決，心安理得，超過最老牌的帝國主義。

以今天的水準，重新思考劉少奇的理論和實踐，思考他究竟說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不是為了追求非此即彼，二律背反，重講好人壞人的故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而是經過歷史沉澱，回頭看更為了向前看。

第一，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論和馬克思、列寧「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學說一脈相承。說明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有一個獨立的從前者到後者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長短取決於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經濟落後的後發型國家，過渡時期將相當長久。所以，他的

學說首先是全體人民解放的學說，這是它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說不同的地方；但它又不僅僅是一般的全體人民解放的學說，而是關於全體人民解放條件的學說，它並不以全體人民要求解放的主觀願望為轉移，而是以這些願望賴以實現的客觀條件為轉移，這是它與各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學說不同的地方。他始終堅持一種客觀的歷史觀察方法，並把自己的全部理論都建築在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分析之上。他的理論與「以社會統一組織生產來改造資本主義即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以及「勞動者的統一分配即原來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嚴格區別。這是他理論上的特點，也是他理論上的優點。

第二，針對中國經濟落後，面對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他特別重視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1953年他明確指出，脫離了生產力的發展，用動搖、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的方法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從不把自己的理論當作一承不變的教條，強加給人民群眾的實踐，相反，他期待著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去理解它，掌握它，檢驗它，發展它。但他的理論，並不是迎合群眾運動的落後心理和盲目自發性的時髦學說，而是同群眾運動的落後心理和盲目自發性進行鬥爭。他對列寧《論中國的民粹派和民主派》、《兩種烏托邦》心領神會，這與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的訓練，資本的國際性，都是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條件，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就不能獲得解放的條件，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就不能獲得解放，社會主義就沒有成功的保證的思想一脈相承。劉少奇特別清楚地懂得，不管資本主義還有多長的生命力，都不可能是萬歲的（即使今天的「後工業社會」、「新經濟」、「知識經

濟」、「信息經濟」、「高科技經濟」仍然不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代替舊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也不可能萬歲），資本主義發展依據歷史規律，不能不轉化為自身的對立物，共產主義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異想代替物，而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轉化物。因此，他們的共產主義理論根本不是對未來社會的想像、描述和設計，而是對現實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一種客觀分析和估計，他們祇是從這種分析之中提出某些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範疇相對立的經濟範疇，而將其不可設想的細節完全置之不顧。那種人為的設計越周密，就越會陷入空想。今天提出的「一百年不動搖」，祇證明了資本主義生命力之強，並不證明資本主義永遠存在。

第三，劉少奇和馬克思、列寧一樣，認為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指從資本主義到包括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因此，列寧也把這個過渡直接解釋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社會是這個過渡時期的直接目的，而在此之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祇是開始過渡的獨立階段，它向「半國家」、「非政治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劉少奇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經由前資本主義到小生產到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到國家資本主義一般發展，看到這種一般發展過程的各種媒介形式，如自由貿易、土地國有化、合作制、資本積聚、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等，也指出它在中國社會中的不平衡發展，它們的同時並存，提出了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導形式的一系列小過渡，把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的過渡同彌補本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民主革命不徹底，以及趕上西方先進國家過程結合起來。也就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改革，階級鬥爭和改良結合起來。劉少奇把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前途聯繫在一起，指出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共同點是嚴格的計算和監督，全

民的監督和計算是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前提。因此，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梯中的最後一級，捨此沒有其他道路。社會主義就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向前再邁進一步。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發展，哪怕是小生產，就其從屬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其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而言，可以直接或間接構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哪怕是國家資本主義，就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而言，也必然是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

第四，劉少奇直接繼承和發展了列寧關於在落後國家正確處理五種經濟成分共存的學說。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為主體的不同過渡措施，即向小生產讓步的糧食稅和自由貿易；向國際資本讓步的租讓制和租賃制，希望以此恢復正常的工農業交換。他們特別重視由於生產資料的匱乏，小農經濟間自願產生的互助合作，特別強調流通領域中消費合作社的作用，把合作制當作狹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已經建立國家統計和監督的那部分大城市工商業的國家資本主義相區別，用於發展小生產（如自由貿易）的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概念，把包括向小生產和國家資本主義讓步的一系列權宜之計都包括在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之中。

第五，劉少奇和列寧一樣，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國家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此，無產階級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指出，由於中國落後，舊式國家辦事程序的存在，人民群眾缺少文化，使用部分舊社會的管理人員，生產內部的無組織狀態和小生產造成的國家與社會的隔絕狀態等等，都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根源。無產階級如果不學會管理，缺乏必要的政治形式保障，不能組織工人的正常

鬥爭，不但克服和抵制不了官僚主義，反而會造成無政府主義的騷亂。因此，在國家機關改革、建立工會和工人的監督、訓練工人參加管理方面作了許多有益的嘗試。

今天，我們重溫這一段歷史，並不是想簡單地說明 20 年的改革開放證明了劉少奇的正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為了進一步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回顧與展望。列寧死後，俄國共產黨的兩個領袖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間爆發了一場一國是否能夠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的爭論。托洛斯基從俄國落後，建設社會主義條件不足，需要靠世界革命來補充的正確前提出發，得出了取消主義和冒險主義，煽起世界革命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錯誤結論。相反，斯大林則從堅持十月革命成果的正確前提出發，得出了喪失清醒估計的所謂「一國建成論」並發展為 1936 年宣佈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為了完成國家的工業化首先強迫農民集體化，取得原始積累，誰反對這樣做，他就搞肅反擴大化，三位一體。這就與經典作家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南轅北轍。他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兩種所有制，兩大階級以及有商品、貨幣等條件下。這種「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國家。這就導致了一系列錯誤：

它取消了向社會主義繼續過渡的問題，過早的提出了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既模糊了社會主義的實質規定，也曲解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它取消了過渡時期應有的分析和估計，掩蓋了過渡時期的矛盾和問題；它混淆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和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理論上對立起來，在實踐上混淆起來；它把本來祇是作為過渡措施但還不可避免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如國家資本主義，合作制通通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東西，掩蓋了這些東西過渡的資本主義性質，

甚至是極落後的資本主義性質；它把一國的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祇能是國際現象對立起來，在東西方兩個世界之間，割了一道鴻溝，把社會主義變成了民族範圍內的東西，不再堅持祇有世界革命才能戰勝世界資本，而是當作保衛蘇聯和實現民族社會主義的手段。

中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爭論，以爆發文化大革命和劉少奇的悲劇（對毛澤東而言，何嘗不是更大的悲劇）劃上了暫時的句號。但歷史並沒有終結。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再現了俄國的悲劇，卻是以另一種形式的再現。在理論上，一方面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對立，要麼就是社會主義，要麼就是資本主義，希望避免、繞過、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矛盾、問題，存在著過渡性質，存在著資本主義性質，要進一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資本主義差不多」。因此，總是搖擺於理論上消滅資本主義和實踐上不能消滅之間，提出限制，但又找不到限制的界線。消滅限制資本主義的結果，不但不能消滅限制資本主義，反而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特別是落後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以階級鬥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即以限制資本主義產生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證明斯大林和毛澤東他們都不懂得在落後國家祇有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是社會主義的入口處，這一系列寧主義的經典提法。

新世紀的開始，歷史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點。當今「七加一」的強國峰會，仍然是當年的「八國聯軍」，這個世界的一切災難歸根結蒂來源於資本的全球化。馬克思主義沒有戰勝資本主義，卻不斷幫助資本主義改變其落後形態。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惟一的批判資本主義最徹底的理性學說。經典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150

多年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出現過。歷史沒有「如果」，不能「假如」，已經發生的事情不可逆轉。

我們仍生活在戰國時代。冷戰時期，我們生活在「恐怖的和平」之下，（真正的恐怖來自大國）、這種和平祇是一種意外。現在，當「新帝國主義」、「不得不帝國主義」、「新羅馬帝國」論借全球化的西風重新崛起時，我們不應該忘記，戰爭仍威脅著整個人類。歷史好像繞了一個圈，又向我們提出是站在八國聯軍一面，還是站在義和團一面？好像別無選擇：「美國欺人太甚，你跟它硬也不行，軟也不是」。「世界這麼亂，沒人管怎麼行，咱們得謝謝美國」。「你不支持美國，就是支持獨裁領袖、流氓國家、恐怖分子，就是和全人類作對，和自由民主作對」。過去一百年，列強世界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們既沒有機會先搶，也沒有力量後搶，祇能自己搶自己（自力更生），苦苦掙扎於世界民族之林。

美國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高於聯合國，也高於國際輿論），需要或聽話，雖獨裁也可支持；不需要或不聽話，雖合法也可顛覆。「強國夢」的根源在於「強國」，小國沙文主義的根源在於大國沙文主義。西方強國內部講自由、民主、人權，當他們輸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把貧窮、動亂、戰爭和污染轉移到落後國家。蘇聯的經驗證明，「乞丐和龍王比寶」，祇能自己垮臺。我們在「別人把自己搞垮」和「自己把自己搞垮」之間，很難選擇，（看看列寧、托洛斯基和斯大林搖擺於「世界革命」、「等待援軍」和「一國取勝」，多麼左右為難），就可知道帝國主義的「硬道理」有多「硬」。幻想剛學到三招二式就和人家叫勁，把人家放倒，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

觀察歷史，既要「自其不變而觀之」，又要「自其常變而觀

之」。馬克思認為，物質的極大豐富是共產主義的前提，這個結論現在看來不對了，物質的極大豐富一直是私有化的根源。人類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均」實際上是一輪一輪的均，不要說美國的「極大豐富」，就是中國的「極大豐富」，馬克思都無法設想。中國內部的最大問題，權力商品化，執政產業化，改革與腐敗賽跑，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垮。但馬克思主義替弱勢群體說話，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祇要資本主義還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永恆魅力就一直存在。

1981年1月，我從內蒙回到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 — 肅清左傾流毒》，代表著當時我對社會主義問題的總結與反思。劉源請我寫一篇序言，上面的一席話和這篇文章，就算是我的序言吧。但願一代人能解決一代人的問題。

（附《學習列寧的過渡學說 — 肅清左傾流毒》一文）

張木生

2002年10月18日